

从研究‘视域’的转变解析中国思想史的书写

李 宁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方式发生了一些重要转变。这些转变主要源于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的早期书写方式进行了反思,并对思想史的研究视域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些探索的过程也是思想史研究方法不断得到创新和丰富的过程,它们共同为书写出优秀的思想史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思想史 研究视域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D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9)03-0027-03

一、思想史研究的早期书写方式

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逐步兴起的。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认识一般被认为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起点。“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观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叙述思想焉求之。”^[1]在他看来,思想史的研究视域极为开阔,包括政治、法律、历史等种种现象。有学者指出:“不管后来的思想家是否承认自己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也不管他们的看法是否一致,客观上他们对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认识与研究,其近源都不能不归于梁启超”,比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中国思想史》、蔡尚思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法》、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其中所标示的观点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论述,或与梁启超的研究思路相近,或更多地受到现代西方学科划分的影响,而其研究范围都较梁氏或多或少地缩小了^{[2] 245}。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思想史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学术界出现了大批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如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李泽厚著的《中国思想史论》、许纪霖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思想史论》、靳德行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等等,这些著作不管是对思想史的研究视域,还是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都做了不少更新和尝试。但是,从思想史的研究视域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思想史著作的书写始终是以人物、流派和时代作为主要内容。“翻开叫做‘思想史’

或‘哲学史’的著作,是睿智的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从孔子到康有为,从《诗经》到《大同书》,天才似乎每个时代都成群结队地来,经典也似乎每个时代都连篇累牍地出,我们的思想史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他们的章节”;“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照片”^{[3] 9}。有人甚至指出“以人物为中心题旨的研究方式,可以说是近 50 年来处理思想史方法之主流。”^[4]因此,研究视域的如何规范以及从何种角度去分析这些进入思想史研究视域的对象成为影响思想史书写方式的重要因素。

当然,“杰出人物”或者“精英”的思想和行为的确对历史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不能否定思想史的这种书写方式为理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认识中国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提供了重要途径和基本线索。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就是这样一个典范,因而也广受学界的瞩目和赞同。

二、思想史书写方式的‘误区’和思想史研究视域的新发展

但是,曾经一段时间以来,思想史的书写方式也走进一些误区,从而阻碍了思想史的研究。有人认为,中国思想史被改组为一座先贤祠,里面供奉着老庄、孔孟等,对他们的评价,无非时代背景、生平简介、范畴概述、阶级分析的八股叙述,远离我们的生活和时代,所谓思想,似乎都那么玄远,而这些大师们一旦进入思想史,又被意识形态烘烤成干巴巴的教条。有人指出《泰晤士报》曾这样评论《西方现代思想史》:“思想史,是思想的战场,而不是亡灵的画

廊”，这句话移用来批评我们的思想史，太恰当了^[5]。的确，如果我们的写作观念不变，思想史的书写方式也仍然不会实现太大的转变。

思想史的研究和书写为什么一度走进了这样的误区？

也许，近几十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失误，或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对待上的错误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初叶进入中国以后，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方法论运用于思想史，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中。曾有“红色教授”之誉的吕振羽先生曾在1955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再版代序“中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社会思想、意识依存于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总是先行的，思想、意识的产生或变革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6]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从而强调思想的阶级属性^[6]。一段时间内，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7]。有学者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叙述方式着手分析说，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叙述方式一般是以某种宏大的概念体系为基础，并且相信这些概念恰当的概括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比如革命与立宪、启蒙与救亡等等都占据了传统叙述的核心部分^[8]。这无疑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由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曾获得愈来愈多的赞同。它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丰富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本来也是“百家”中的“一家”，用独尊一统式的儒家道统观或者宗教教义式的神圣观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从根本上扭曲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原本原义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创造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事实上过去有不少人正是从儒家的道统观和宗教的神圣观的态度上来对待马克思主义^[9]。李泽厚也指出：“在学术领域里，搞单一的东西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我感觉我们有些固定的模式，如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中国历史就是农民跟地主的斗争史，文学史就是

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斗争史^[10]。几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仅仅是“理论化”的意识形态的历史。

葛兆光批评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史书写方式，即思想史仅仅只是“精英”的“经典”意识。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葛兆光认为，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知识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记述，这些历史记述并不一定切中思想世界，尤其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本相，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档案和史书中，都可能存在“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3]”。的确，与历史学的其他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11]。

葛兆光进一步指出，思想与学术“有时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是悬浮在社会与生活的上面的，真正的思想，也许要说是真正在生活与社会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它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3]。在葛兆光看来，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即所谓“一般知识与思想”。

的确，为了尽量还原思想的资料，凸显思想的意义，思想史应该有一个更为本源的研究视域。葛兆光的看法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其他也有学者提出，思想史的研究视域“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关于思想史的“对象”或“史料”，我们应该具有更为宏阔的视域^[12]。汪荣祖也提出，思想史研究不仅要重视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而且“最好亦能探讨一般大众之思想”；不仅要注重对人的思想的研究，而且还应涉猎对“非思想因素”，即社会、阶级、政治等物质因素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所谓“正规”思想，而且对诸如“信念”、“希望”、“欲望”等“非正规思想”也不应忽视^[2]。李良玉在《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一书中这样归纳并详细解释了思想史的五类内容：科学人文、宗教思想与哲学、政治思想、民众意识与

思想、其他专题思想^{[13][1-19]}。可以说,这是对思想史的研究视域进行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和分析。

三、思想史研究视域的转变必然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创新

如何解释和分析这些进入思想史研究视域的思想史资料?

其实,思想史研究视域的转变本身也必然意味着学术方法的创新。仅仅用从马克思主义中抽象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视角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个学术整体,思想史的研究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去探讨;应该是有些人从宏观角度,有些人从微观角度,有的从哲学角度,有的从历史角度,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各自发挥所长去进行工作,进行研究^{[10][256]}。

虽然有学者认为思想史的书写“如果单单停留在史家的传统手法上,也就难以与社会史、政治史、学术史、经济史、制度史等学科拉开距离^[14]”。但是,史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葛兆光提倡的、由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还是非常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方法。因为只有运用这种方法,不断挖掘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考证出这些东西是怎样一步步地被建构起来的,思想史本身应该考证权力和知识的不断纠缠及其如何产生了现在所认为的一些“常识”,揭发那些常识的并不当然正确的出身^{[15][259]}。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思想史的书写^[16]。李良玉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首先肯定了梁启超、胡适等人思想史研究方法中的学术财富,同时也提出了用“现代学术方法”整理思想史的必要,进而提出了验证、对比、解读、多思、多读几种具体方法^{[13][21-34]}。

由此可见,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最主要的方法论,用来分析、研究历史上的各种学说,但已经有研究者有意识地试图从长期束缚和困扰人们头脑的政治教条主义中走出来,辩证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力求在研究中保持学术的客观性与思维理性^[17]。这是社会进步和学术理性在思想史领域中的体现。

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一是为了说明思想的原始文本的含义,二是要指出思想的价值^{[13][2]}。而首要的

方法就是坚持理性的标准“对不言自明的常识的挑战^{[15][72]},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去透析思想史研究的视域,由此还原思想生活的丰富多彩。

思想,原本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生活的姊妹、时代的镜像^[5]。思想史的书写,也应该不拘一格,优秀的思想史,也应该文采飞扬!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
- [2] 巩本栋. 领域的拓展与方法的更新[M]//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中国思想史与思想家评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3]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导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4] 王尔敏.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35.
- [5] 蒙木. 优秀的思想史, 也应该文采飞扬《西方现代思想史》的写作观念值得我们学习[N]. 环球时报, 2005-03-28 (19).
- [6] 吕振羽. 中国政治思想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 [7] 李泽厚.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中国思想史论: 下.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973-974.
- [8] 成庆. 思想史该如何书写?[J/OL]. 香港: 21世纪, 2005 (1).
- [9] 周继旨. 历史主义的恪守与时代精神的灌注[M]//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中国思想史与思想家评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24.
- [10] 李泽厚. 中国思想史杂谈[M]//走我自己的路.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 [11] 朱学勤. 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J]. 中外书摘, 2006 (9): 55-63.
- [12] 黄玉顺. 思想及其历史的生活渊源: 论“思想史”及其“对象”问题[J]. 湖南社会科学, 2009(2): 14-17.
- [13] 李良玉. 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14] 张宝明. 思想史应该怎么写?[J]. 博览群书, 2008(5): 81-84.
- [15]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视野、角度与方法[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16] 方光华.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N].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11-15(3).
- [17] 刘泽华, 葛荃.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引论[M]//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5.